



在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,每一段历史都有它难以替代的独特性。站在历史的舞台上,有人居庙堂之高弄潮在风口浪尖,也有人处江湖之远默默辛勤耕耘。无论荣辱浮沉,他们用个性为时代提供注脚,像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的另一面。

即日起本报将推出“符号人物”专栏,走进这些人物,还原他们身上承载的历史变迁,寻找他们为这个时代留下的改革启迪。

对话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、山东人曲格平： “改革利益集团是治霾关键”

“不保护好生态环境,也要亡党亡国”

齐鲁晚报:最近北京空气怎样?雾霾多吗?

曲格平:今年2月底,北京经历了今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雾霾,连续六天6级重度污染,雾霾遮天蔽日。说实话,我现在呼吸起来,感觉很不舒服。

齐鲁晚报:可以去环境好的地方躲避。

曲格平:去哪儿避?现在我国环境污染非常严重,将近1/6的国土正在遭遇灰霾天的严重侵袭,而且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较发达地区,污染程度还在加剧。尤其京津冀这一带,雾霾非常严重。

齐鲁晚报:您对我们目前生活的环境如何评价?

曲格平:这么多年来,我很少听人称赞中国的环境状况,每一届国家领导人都在讲“形势严峻”,实际上是非常严峻,十分严峻,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。不光是大气污染,还有水污染、土壤污染、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,存在的问题很多、很大,老百姓最起码、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感都受到威胁。

齐鲁晚报:所以去年您说:“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,不消除环境污染,不保护好生态环境,也要亡党亡国。”

曲格平:是啊,去年说这句话时,我是琢磨了好久才说出来的,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,但归根结底还真是这么回事。这个问题非常严重,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。

齐鲁晚报:当时,您这句话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关注和讨论。

曲格平: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很多网民又把我这句话翻了出来,见诸各大媒体和网站,网民和两会代表又都在引用我这一句话,现在全国基本上都知道了。

“‘数字游戏’是全国都老大难的问题”

齐鲁晚报:如果给现在的环境污染排名的话,您认为什么污染最严重?

曲格平:雾霾肯定是第一位。上世纪70年代,说日本东京的孩子看不到蓝天,我们还当个笑话讲,现在北京的孩子能看到蓝天,已经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了。

第二是水污染。中国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,但水污染尤为严重。不过,山东省的环保工作成绩是非常卓越的,有59条河流都能养鱼,这个指标很过硬。现在我还看不到全国有第二个地区敢这么说。

第三位是土壤污染,污水灌溉,空气污染,颗粒物沉降,这些都会污染土壤,特别是农药、化肥对土壤的污染更严重。

齐鲁晚报:公众一直关注的全国土壤普查数据,到现在也没有公开,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这个数据?

曲格平:环保部和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调查,下了很大的力气,但我也看不到这个数据。其实环保部即使想公开,估计也很难,因为牵涉到太多部门和地方的利益了。

齐鲁晚报:说到数据这个问题,我们有种感觉,现在每年

本报见习记者 张红光 深度记者 郑雷

“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,不消除环境污染,不保护好生态环境,也要亡党亡国。”这是曲格平去年说过的一句话,时隔一年,言犹在耳。

可雾霾的蔓延、环境的恶化仍在继续。“1/6的国土面积都遭遇灰霾天的严重侵袭。”说这话时,84岁的曲格平表情无奈,他不停地喝水,甚至差点被呛到。这些年,他几乎辞掉了所有的社会职务,却无法停止对环境保护的关注。

“人要做点事,否则自己老了,回顾这一生会感到活得没价值。人也要敢于说真话,否则将来的问题会更严重。”

3月19日,这位被誉为中国“环保之父”、曾担任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、山东老乡曲格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《齐鲁晚报》专访。这位老人表示中国的环境问题“太多、太大”,而“硬法”——法治,尤其是严厉的执法,才是对付雾霾的根本“良方”。



19日,曲格平在北京的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摄



19日,曾经环境优美的水乡绍兴也难逃雾霾侵袭。 东方IC供图

有关部门都会通报,说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度下降,但老百姓的感性认识恰恰相反,这是为什么?

曲格平: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我说公布的大体上都有这么个数据,仅供参考吧。有些数据并不是太准确,有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还会与现实形成极大反差。

齐鲁晚报:为什么数字有可能失准?

曲格平:首先是监测网络

并不是很齐备,可能报不全;第二,企业不如实上报,它们想尽办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,中国是这样,外国也是这样。现在国家环保部正在查处一些数据造假的企业,发现数据不造假的企业太少了,这个情况具有普遍性;第三,各级地方政府管理不科学、不到位,涉及本地区利益,也不愿意报实数。各级政府现在仍然是只看重GDP,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,现在有关领导被问到环境问题,羞羞

答答,身上直冒汗。

齐鲁晚报:看来您在做环保局长时,就深有感触。

曲格平:全国“数字游戏”也不仅是环保一家,是一个老大难问题。

40多年来,决策还停留在理念层面

齐鲁晚报:那您认为,现在我国雾霾如此严重的原因是什么?

曲格平:除了客观天气原因外,其实主要是人为原因,有三大原因:第一,工业、生活中煤炭的大量使用是主要原因,我们现在使用的能源中近70%还是煤炭,在世界年燃煤量排名上,中国绝对第一,这是造成雾霾和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。第二,汽车不断增多,尾气大量排放。第三,生活方式的影响。现在家庭取暖做饭,主要还是煤炭,天然气会好一点,但是并没有普及。过去生活方式的污染可以忽略不计,现在所占比重却显著提高。

齐鲁晚报:我国环境保护已经走过了40多年历程,你对这个历程如何评价?

曲格平:40多年来,中国领导决策层提出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,但是这些发展战略多数只停留在理念层面上,停留在文字上和口头上,很少见诸行动。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,长期没有摆脱过度追求增长速度的观念,没有注意解决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、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。

齐鲁晚报: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?

曲格平:我们现在主要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治污,就是对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限产、停业或者关闭。可是企业也有对付办法,这个排污口关了,还有通往地下的另一个隐蔽排污口。其次就是政府进行环保宣传、说服和教育等,这种方式没有刚性约束,主要看企业的自觉性,效果堪忧。

改革开放不久中央就提出转方式

齐鲁晚报:指望企业自觉肯定不行,那您认为现在治理雾霾最大的阻力和瓶颈在哪里?

曲格平:主要在于政府,企业不可能主动去保护和治理环境,但光靠政府说教也不行,政府必须履行其责任,通过规章制度和严格的措施来约束和控制企业排污行为,否则根本没用。

齐鲁晚报:还有没有其他原因?

曲格平: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也是治理雾霾的一大关键。但是实在是太难了。

齐鲁晚报:为什么这样说?

曲格平:改革开放不久,中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,但这些年进展并不大。因为现在改革权掌握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手里,很多重点大型企业都在他们的利益范围之内。要是改的话,钱就不能往自己腰包里装了,得拿出来治理环境,谁愿意啊,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,而是一个得不到解决的实质问题。

齐鲁晚报:割谁的肉谁心

疼。

曲格平:只要牵扯到自身利益,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。再说各级政府眼里只有GDP,它们和企业都不愿损失自身能得到的最大化利益。

齐鲁晚报:面对既得利益集团,我们该怎么办?

曲格平:想要改变环境污染的现状,决心、勇气、办法和措施,一样都不能少,改革必须要动真格了,向既得利益者开刀,政府必须履行其应尽的责任。

齐鲁晚报:您看到政府的决心了吗?

曲格平:3月13日,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,李克强总理对日益恶化的环境,一个崭新而又铿锵的提法就是,要“铁腕治污”加“铁规治污”。只要政府下定决心动真格,把环境保护和治污工作放在首位,提到“不消除环境污染,也要亡党亡国”的高度,我想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。

“最缺少法治,尤其是严厉的执法”

齐鲁晚报:您认为我国当下的环境保护与治理,最缺少什么?

曲格平:我一直认为,最缺少的是法治,尤其是严厉的执法。其实我们不缺好的方针政策,我们一直是“领先的方针,脱节的实践”,但一到执行,就完了。

齐鲁晚报:那您说的法治,具体怎么理解?

曲格平:第一要有法律,第二要有执行机构。谁要是违背了这些法律和规定,执行机构就有权力去严厉整治。一些国家的环保部腰杆特别硬,背后有法律的强力支撑,中国却截然不同。

齐鲁晚报:您觉得我国现在的环保法治环境如何?

曲格平:我曾提倡把环保的法治作为中国法律的一个突破口。其实,我国的法律不算多,也不算少,几百部法律,环境方面就接近30部。

齐鲁晚报:法律不少,为什么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?

曲格平:一方面,环保法规定得过于笼统,缺少一定的量化和细化,原则性不强;第二,全国普遍不太重视,认识不到位,说到做不到;第三,一些政府部门执行不力,遇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齐鲁晚报:我们想要打赢雾霾这场战役,应该怎么做?

曲格平:第一,要把中央的规定落到实处,最根本的就是法治,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白说。第二,政府目标一定要具体。根据国务院去年9月出台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,到2017年,每年要采取什么措施,达到什么标准,都得计算出来,然后仔细研究,不能光靠一把手说了算。

第三,全民监督,比如监督私营工厂。现在大企业一被曝光,股价立刻下跌,公众要是觉醒了,力量还是很强大的。

第四,保护环境要从自身做起。尽量少开车、多些绿色出行。全民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大潮中来。

(下转A05版)

近70万美元奖金都给家乡做好事

捐建小学成了肥城最好小学之一,还在母校山大设了奖学金

3月19日,记者来到曲格平在北京的家中。当天上午的北京是中轻度雾霾,阳光并不浓烈,零星星星洒进屋里,落在客厅内靠近阳台的两排书架上。曲格平家中摆设很简单,最多的就是书。

在采访的前一天,曲格平因为身体不好,在医院做检查,他接到记者电话后,很激动:“我这身体,即使拒绝别的客人,也不能拒绝我老乡啊。”

(上接A04版)

“2050年达到西方治理水平,就不错了”

齐鲁晚报:2013年9月,国务院出台了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,有人把它称为中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第一个“五年规划”,您怎么看?

曲格平:以国务院的名义出台治理大气污染的行动计划,在新中国环保史上来说应该是第一次。这足以看出中央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决心。这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,确立的具体目标是到2017年,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%以上,优良天数逐年提高。

齐鲁晚报:这五年是不是很关键?

曲格平:这是迈出的第一步,很关键。这一步我们要是迈不出去或迈不好,这就意味着中国治理环境和雾霾没什么希望了。

齐鲁晚报:实现这个目标,难度大不大?

曲格平:有一些不同的声音,说这个目标定得有点低了,我反驳说,就现在而言,其实已经是很高了,到时能完成这个目标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齐鲁晚报:抛开这些数字,要是通俗点说的话,要让老百姓天天能看到蓝天白云,得等到什么时候?

曲格平:完成2017年的目标,只是我们环境治理迈出的第一步,是非常重要的基础。

在这个基础上再过5年,也就是到2022年,可能会好一些,在这个时候,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设备的更新换代,一些企业的污染会明显减少,甚至污染物的曲线有可能会减缓或者下降。

再过5年,到2027年,不过基本把希望定位在2030年,环境保护会看到成效,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行业会得到有效遏制,环境保护会向更好的方向转变。

再过10年,到2040年,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局面。就算到2050年,要是能达到西方治理环境的水平,那也是相当不错的,中国太复杂了。

“治雾霾不是拖经济后腿,而是机遇”

齐鲁晚报:有种说法,说中国要想根治雾霾,必须经济发展倒退几个点,您怎么看?

曲格平:有些人有这个担忧,但我认为,提出这些问题的,一般都是执政的领导者。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,并且投入不需要那么大。有经济学家计算过,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,环保投入占到GDP的5%,都几乎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,所以我认为,根治雾霾不会拖经济的后腿。

齐鲁晚报:那您认为,当下的环保投入多少比较合适?

曲格平:专家计算过,就当下的情况,要完成国务院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目标,现在应该投入GDP的2%-2.5%。低于GDP的2%是不可能完成2017年目标的。这些都是公开科学计算出来的。但实际情况是,现在地方环保投入一般只占GDP的1.5%左右,高一些的能占到2%,但几乎很少。

齐鲁晚报:也就是说,您认为治理雾霾不会影响经济发展。

曲格平:我倒是认为,治理雾霾恰恰是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机遇。现在,环境污染这么严重,过去落后、陈旧的生产设备,高消耗、低产能、高污染的粗放生产方式,早已不适合现在经济发展的要求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,我们现在应该把高消耗、落后的生产设备逐步淘汰掉,为低效能、高产出、低污染的新技术、新设备腾出空间。

解决雾霾是需要一个过程,根本不是一两天的事,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,治理环境,告别雾霾,任重道远。但不管怎样,碧水蓝天,我们一定要实现。



肥城市桃源镇晒书城小学电脑教室建成后,曲格平前来察看。(资料片)

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见习记者 张红光

为家乡的79棵树求情

曲格平听说要砍家乡的老树,给当时的市委县委打电话求情,最后柏树还是被砍光了。之后一想起这些古树,他都会掉眼泪。

1930年,曲格平出生在如今的山东省肥城市桃源镇东里村。家境贫寒,曲先生是兄弟姐妹六人中唯一上过学的。这里是孔孟之乡,所以他从小就信奉讲信义、待人忠厚,小时候自家吃不上饭,村里人接济一点,也是经常的事情。

东里村挨着北山,山上有古代修建的山寨,在年轻的曲格平看来,寨墙像八达岭长城一样雄伟;山寨中央的山峰上,有座香烟缭绕的

玉皇阁庙,山寨南坡下,有汉代柏树林,其间有座孔子庙,叫做晒书城。传说当年孔子路过山下时遇雨湿了书,在那里晒过书。

小时候的曲格平经常和伙伴们在柏树后面捉迷藏,整天在庙里玩,这里存下了老人的美好童年记忆。

3月19日,在北京的家中,曲格平向记者回忆起这些时,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不过,回忆也有痛苦的时候,晒书城的汉代柏树一

共有79棵,在其他地方,曲格平都没有见过这么雄伟的柏树林。上世纪80年代,附近修铁路,相关方面要砍柏树做枕木。曲格平听说,给当时的市委县委打电话求情,最后柏树还是被砍光了。

后来有专家告诉他,柏树不适合做枕木。他回答,就算不做枕木,遇见其他的事情,这些树也会被砍光。之后一想起这些古树,他都会掉眼泪。

延伸阅读

环保之父曲格平



年轻时期的曲格平。(资料片)

曲格平1930年6月生于山东肥城。毕业于山东大学,先后担任保定胶片厂副厂长,化学工业部处长,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处长。教授,世界著名环境科学专家,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曾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,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,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名誉院长。

曲格平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,也是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。20世纪70年代,曲格平第一次把“环境”和“保护”这两个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起,这才有了人们后来熟悉的“环保”二字。

此外,在环保界,曲格平成就了多项第一: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,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。他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体系,心目中最大的使命,就是“让自然有法保护”。他被外界称为“中华环保第一人”、“中国的环境保护之父”。

“当了大官”,给村里建了一所学校

给家乡修完小学征求名字时,镇里建议叫“曲格平小学”。曲格平说,如果叫这个名字,我可就出钱建学校了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因为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,曲格平得了很多奖,其中几个国际奖项的奖金一共有70万美元。为家乡做贡献的机会来了。

当时有人劝他,拿这些钱买点房子,一万美元,就能在北京买个很阔气的宅院。他回答,我不能自己花这个钱,我想做公益。

他问村子里,你们需要我做点什么事?村里乡亲讨论了很久,回答说,你当了大

官给建个图书室吧,十平方米就行,最好能二十平方米。

曲格平找到了北京一所设计院的朋友,设计了600平方米的图书室,想放到村子的学校里。

村里和镇上的干部都很难,学校太小,放不下这么大的图书室。跟曲格平商量时,曲格平说,那就正好把村里的旧学校扩建一下,把图书室放里面。

最后,镇上征求他的意见,说镇上要建一所中心小

学。能不能把这所中心小学建到东里村,就在晒书城前面,由他来解决资金,小学和图书馆一起建了。

听到这个建议,曲格平在电话另一头高兴地跳了起来。2009年,先建立的图书室和后建立的小学全部完工。当初征求小学名字时,镇里建议叫“曲格平小学”。曲格平说,如果叫这个名字,我可就出钱建学校了。最后学校定名“晒书城小学”。

励5000元。

70万美元奖金,曲格平没有留给家人一分钱。除此之外,他还想方设法,联系朋友,重修了家乡遭到破坏的玉皇阁和晒书院。

曲格平告诉我们,有一次,他和一位副总理级老朋友吃饭时,对方问,你工资还没我高,哪里来的钱建学校呢?

曲格平把资金来源跟他讲了,老朋友开心大笑,说,我的担心总算没有了,原来你不是个贪官。

朋友说“原来你不是贪官”

一位老朋友吃饭时问他,你工资还没我高,哪里来的钱建学校呢?曲格平把资金来源跟他讲了,老朋友开心大笑,说原来你不是个贪官。

在学校建成典礼上,曲格平特别感谢乡亲们对于建学校的支持。需要征地建学校时,村里人说随便怎么划都行,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去上学,这是天大的好事儿。

为了建设晒书城小学,大部分投入基金会的国际奖金花完了,曲格平又从家里拿钱投进去,再去四处求人拉赞助。

谈起晒书城小学,曲老先生一直用较快的语速,84岁的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。

他很得意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晒书城小学投入使用后,自己要求要配备电脑教学。配备了60台电脑的晒书城小学,也成了肥城第一家有计算机课的学校。如今晒书城小学,是肥城最好的小学之一。

曲格平曾利用联合国环境大奖的10万美元奖金,推动成立了中华环保基金会,随后成立曲格平奖学金。奖学金设在了他的母校山东大学,及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,每位获奖学生奖

深入·更见精彩

电话:96706056

洪波工作室

邮箱:hongbogongzuoshi@163.com